

# 当代史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种全球视角的考察\*

[美] 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教授

**摘要** 本文的目的在于批判、检视过去半个世纪史学思想和历史书写的主要变革及其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势头，试图以关注社会结构和变革过程的富于分析性的社会科学并结合各种量化模式取代只关心政治事件和名人的传统叙事史学，该取向与当时各种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认定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议会政治模式乃全世界奔向现代化的圭臬。不过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述取向遭遇强烈不满，表现在诸如美国的民权运动、越南的反后殖民战争、妇女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及日渐升腾的环保意识。史学的不满在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科学取向——只关注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结构和过程——的拒斥中得到了表达，历史不再被看做科学甚至不属学术而蜕变为一种想象的文学作品。西方文化及其科学的优越性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呼吁一种另类的关注大众各个阶层的历史文化，比如印度的“庶民群体”，所谓历史乃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整合过程及史学具有客观性的观念均遭拒斥。1990年前后苏联体系的解体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一方面铲除了西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的障碍，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世界各地对文化霸权的抵抗且通常是暴力形式的抵抗。就史学而言，一方

---

\* 本文原为伊格尔斯教授2008年4月24日在柏林自由大学召开的全欧历史学博士专题学术研讨会上的开题发言，原名《全球视角观瞻下现代欧洲史的断裂与延续：历史、史学史及史学史史中的断代问题》，后经作者本人大幅修改，并重定此题，特囑《全球史评论》发表，以饕读者。



面,20世纪70—80年代的主流是关注民族和种族平等、底层阶级的积极作用、女权等,甚至到了1990年以后仍方兴未艾,呈现出全球视野;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理论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在各种新社会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新的社会现实引发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更多关注,而社会科学亦从后现代主义的提问中获益匪浅,包括后者对文化因素的认可。

**关键词** 阶段;当代史学;全球视角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史学思想和历史的书写都经历了根本的变革。本文试图对这些变革作一简要的批评和梳理,重点虽放在最近一段时间史学思想的重新定位,但要真正理解这一定位却需先回顾一下此前的历史思想背景。

自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sup>①</sup>一书问世以来,人们便津津乐道所谓的“范式”及“范式转型”,好像这一时髦概念不止适用于物理和自然科学,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也是一样。库恩认为,一个自然科学群体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把持某种一致认同的信念,谓之“范式”,并以此为基准在方法和解说模式上有所作为,而一旦该“范式”再也无法满足研究的需要,便有新的“范式”取而代之。这就是17世纪发生的所谓“科学革命”。迟至1965年,尚有美国史学家约翰·西哈姆主张,历史研究中也类似的情况发生。西哈姆认为:“在改造西方人的思维、塑造现代人的心态方面,19世纪史学运动的影响可能仅次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sup>②</sup>因此,正如某种科学世界观决定人对自然现实的理解一样,凭借一种新史观便可洞悉人类知识变迁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这一新史观业已成为现代人心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问题是,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是具有某种高度(若非绝对)一致性的科研活动,而前者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或差异性。另外,历史研究绝不仅限于历史的书写,而同时包括人们历史记忆

<sup>①</sup>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sup>②</sup> John Higham, Felix Gilbert, Leonard Krieger,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1965, pp. ix—x.



的多种方法和多样方式。把人们有关历史研究的目的及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罗列起来，俨然呈现出一条涵盖范围颇宽的光谱：光谱的一端，有史学家主张历史研究在于重塑真实存在过的一切，历史须完全客观、精确，如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历史容不得任何虚构的成分；<sup>①</sup>而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有史学家认为，历史不过是想象作品的一种形式，<sup>②</sup>无论如何历史总包括各种形式的虚构成分而绝无可能接受客观真理标准的检验。这两种极端形式的历史知识理论总能找到各自的支持者，但却鲜有历史学家将其付诸自身的历史研究或历史书写实践。历史学家总是在这两极间徘徊。

但无论如何，现实的历史研究总呈现某种主导的趋向。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依据觉察到的趋向辨别历史研究的时期。

## 第一阶段，约从1825年至1890—1900年

历史学家有意识地试图将历史改造成一门精确的科学，虽然针对科学的内涵人们从未达成一致的认同。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1）主张史学应仿效自然科学，致力于发现并陈述规律，<sup>③</sup>而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的《提升史学使之臻于科学》<sup>④</sup>一文却反驳巴克爾的观点，强调历史研究的自由和不确定性，但他还是坚持人文历史须科学化，遵循一种完全不同的适合历史学家的逻辑。

19世纪的巨变突出表现在历史研究的专业化上，先是在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柏林大学，后来逐渐遍及欧洲、北美和日本。人们普遍认为历史应成为一门科学。此时的历史科学包含两个主要方面：其一为文献批评（Quellenkritik），坚持历史必须基于原始资料的批判性考证，从而使历史科学不

---

① G. R. Elton and Robert Fogel, *Which Road to the Past? Two Views of History*, New Haven, 1983. 二者均视历史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不过艾尔顿更接近兰克的人本主义取向，而福格尔倾向于经验的、量化的社会科学。

②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1973.

③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2 vols., London, 1857, 1861.

④ Droysen, “Erhebung der Geschichte zum Rang einer Wissenschaft”, in Peter Leyh, ed., *Historik: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Stuttgart, 1977, pp. 451—469; 同时参阅 Droysen, “Art and Method”, in Fritz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New York, 1956, pp. 137—144.



同于普适的自然科学；其二，与其他科学相仿，认为历史科学须植根于专业的机构背景方可成型。因此，西方世界首度出现了附属于某所大学或研究院的专业史学家与无依无靠的业余作者泾渭分明的局面。专业史学家，如同专业科学家一样，投身于绝对客观的理想，努力寻求能与专业科学家共享的客观知识，虽然专业史学家的科学概念俨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概念。

不过西方的史学专业化却并非完全独特新颖的创举：在中国及学术模式上依附中国的东亚诸国，专业史学家早在 2000 多年前即已存在，虽然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亦有不同于西方专业史学家的地方。在中国，历史是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官僚记述的，主要服务于皇帝。中国的历史同样执著于精准，但缺少科学中立的信念。比较而言，西方史学专业化的特点是追求客观并注重专业训练和学术机构组织。这一点后来被步入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如日本所采纳，仿效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接受科学的世界观和信念。兰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认为，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评判过去，而在于“如实地陈述历史”，<sup>①</sup> 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兰克强调史学陈述必基于对史料的批判考察，这对史学研究方法的精确化确有提升；但这一做法却对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设定了界限。其一，强调史料限制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此前大量的历史作品——不限于西方作品，也包括卡尔顿（Ibn Khaldoun, 1332—1406）那样的中世纪穆斯林史学家的作品——均试图展现普世史却缺乏富于批判性的方法论，而仰赖史料的新史学则局限于西方且大多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此相反，英国由非学院派作家 1736 年发起的《普世史》把受众锁定在普通读者，希望借此普及世界各地包括非洲的历史。那种认为专业史学能够确保客观的主张从 19 世纪研究型史学肇始便遭批判，虽然批判的矛头从未指向其客观性的缺失。事实上，与非专业的“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相比，声称摆脱了一切偏见的所谓“科学的”史学（Geschichtswissenschaft）从一开始便被高度地意识形态化了。史学专业化肇始于政府创建和资助的新的研究型大学，政府为史学设

<sup>①</sup> 参阅 [德] 兰克《〈拉丁及日尔曼诸国史〉第一版序言》（1824 年 10 月），载于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Indianapolis, 1973, p. 137。



定了明确的政治功能。专业史学在官僚的、半独裁的普鲁士政治体制中找到了自身的根源，普鲁士的政治体制后来亦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直接范本。而在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相对盛行的英国与荷兰，史学研究踏上德国的专业化道路则相对较晚，这一点非常显著。

如果说有所谓史学研究的范式，这一时期被广泛接受的兰克专业史学模式可谓最为接近。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范围从一开始便同某些意识形态的假定发生了妥协。新史学严格依赖史料导致其对政治及反映当时政治结构的官方文件过度重视，历史叙述主要关注发生在上层的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当然，恰如19世纪法、英社会史学家所展示的那样，原始文献也可以反映社会及文化的方方面面。随着帝国主义的兴起，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被反复强调，非西方地域不再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沦为西方政策和扩张的点缀品。史学的所谓科学派希望摆脱形而上学假定对史学的圈囿，但在有关历史过程及规定性政治、社会秩序的观念上仍抱定某种推测或臆想，比如兰克史学便得到新教笃诚的强力支持。从理论上说，历史严格有别于其他学科，用被奉为“历史科学之父”的兰克的话说，史学应遵守的原则即“严格陈述事实，不管事实……多么地不令人欢喜”。<sup>①</sup>但兰克亦曾强调“历史有别于所有其他学科的特点在于它也是一种艺术”。<sup>②</sup>实际上，19世纪的史学名著常被人当做伟大的文学作品来读。因此，莫姆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虽一再强调史学的准确和方法的严谨，却因其作品本身而于1902年获得有史以来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历史有取代哲学而成为人类认识自我的主要工具的趋势。这应该就是上述西哈姆谈到19世纪史学革命与17世纪科学革命相类时的心中所想。

历史小说中往往包含大量的历史，以至于学术与想象作品之间的界限不再绝对清晰：二者均立意展现历史的真实，二者均希望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如实传达而不是歪曲，虽然最终都无可避免地扭曲历史以服务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大量的专业史学作品服务于某种政治功能，创造——或称发明——了一种民族的且主要是民族主义的认同。但也有相当规模的专业史学，尤其是

① 参阅 [德] 兰克《〈拉丁及日尔曼诸国史〉第一版序言》（1824年10月），载于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Indianapolis, 1973, p. 137。

② Ranke, “On the Character of Historical Science”, *ibid.*, p. 33.



在德国之外的专业史学,走向了他方,比如兰克的学生、瑞士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就转向了文化史。布克哈特觉察到“文献批评”的不足,认为艺术表现对刻画某一时代文明的特征甚为重要。

## 第二阶段, 约从 1890—1900 年至 1945 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兰克史学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广泛拒斥, 或至少被大幅修正。这是业已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高度工业化及政治上日渐分立的人群对史学现状的反应。一般认为, 所谓“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肇端于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对德国史的重新解读。<sup>①</sup> 兰普雷希特认为, 研究历史发展必须将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同时考虑进去。在德国, 兰普雷希特的主张遭到大批坚守兰克史学模式的学院史学家的反对, 后者坚持为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创立的半独裁性质的民族国家正名。不过另一方面, 大批中学教师和更广大的德国公众对兰普雷希特的德国史作出了积极的反应。<sup>②</sup> 在德国之外, 兰普雷希特提出的问题(而非他本人的做法), 逐渐演变成史学家有关治史方法的大讨论。此时提出的新史学方法有两点与兰克史学大相径庭。首先, 史学家认识到, 在现代世界书写历史必须超越纯然的政治事件叙说, 为此, 有必要将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引入到历史的书写之中。1900 年, 波尔(Henri Berr, 1863—1954)在法国巴黎创建了《综合研究》(*Revue de Synthèse*)杂志, 旗帜鲜明地标榜史学必须致力于内涵广泛的综合研究。其次, 史学家呼吁向社会科学家打开史学的大门; 这一点曾遭到兰克史学拥护者的坚决抵制, 是因为后者认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取向是非历史的做法。不过社会科学却绝非只有一种模式。在德国之外, 很少有史学家像兰普雷希特那样执著于一种他自认为完全可以揭示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史学, 更多的史学家只是呼吁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社会学和经济学, 在法国还包括地理学。总之, 史学在保留自

<sup>①</sup> Roger Chickering, *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 Arlantic Highlands, 1993.

<sup>②</sup> Peter Schumann, *Die deutschen Historikertage von 1893 bis 1937*, Univ. Marburg dissertation, 1974.



身视角的同时应向社会科学开放。美国的“新史学家”<sup>①</sup>如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1932）、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比尔德（Charles Beard, 1874—1948），比利时的皮朗（Henri Pirenne, 1862—1935），<sup>②</sup>法国的费布里（Lucien Febvre, 1878—1956）和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1929年创立《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等均持这一观点。1931年，类似的学术期刊在波兰创立。不过虽称“经济史”，上述两期刊在学术取向上却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后者在当时的法国史学界颇有影响。年鉴派虽不忽视经济因素，却从不把社会现象还原为经济基础，而着眼于不同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重要的精神面貌因素。<sup>③</sup>此时所有形式的社会史均以西方为核心而缺乏全球取向；不过不同于兰克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派否认历史的线性进步并最终导致现代西方的完满。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史均以现代西方为主要的关注点，主张现代西方乃文明与进步的制高点。在过去的科学史学中被完全忽略的普通人此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历史叙述的核心依然是社会结构。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进步主义史学家虽有一定的民主倾向，但却绝口不谈美国黑人遭受的种种歧视。

19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女史学家——麦考利（Catherine Macaulay, 1731—1791）可算是个例外——即使史学专业化同样排斥妇女，因为大学里根本就没有女史学家的位置。1890—1945年间也曾出现过少数几位女史学家，比如英国的哈蒙德（Barbara Hammond, 1873—1961）和韦布（Beatrice Webb, 1858—1943）、美国的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1876—1958），但她们没有学术头衔，所以主要是和丈夫合作。<sup>④</sup>迟至近日，除了玛丽·比尔德的作品之外，依然很少见关注妇女历史作用及其生活状况的专著问世。艾琳·鲍威尔（Eileen Power, 1889—1940），作为第

① Ernst Breisach, *American Progressive History: An Experiment in Modernization*, Chicago, 1993.

② Bruce Lyon, *Henri Pirenne: 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 Ghent, 1974.

③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Cambridge, 1990.

④ 在英国，夫妇联合治史的有巴巴拉·哈蒙德（Barbara Hammond）和约翰·劳伦斯·哈蒙德（John Lawrence Hammond）夫妇及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锡德尼·韦布（Sydney Webb）夫妇；在美国，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与丈夫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也有着密切的合作。



一位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教授职称的女史学家,曾撰述过中世纪普通人的生活,其中包括妇女的生活。

### 第三阶段, 约从 1945 年至 1968 年

自 1945 年始的这一时段标志着史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向。此时,旧有的问题重新抬头,主要是在美国,即历史若要成为科学是否该依照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重建,社会科学照例是遵循自然科学的逻辑。<sup>①</sup>不同于以往的科学两分法,即一种是试图以特殊的阐释人类学方法厘清日常文化背景下的意义和意图的人文科学,另一种是所谓硬科学,历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越发突出的倾向,把历史主要看做是具备分析性的社会科学,关注见物不见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计算机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更推动了这一定向的展开。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史学趋向报告中指出:“对量化的寻求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强劲的发展趋势,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明晰区分 1970 年与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的史学态度。”<sup>②</sup>

当巴勒克拉夫 1979 年说这番话时,社会史学家早已开始摆脱史学对数字的痴迷。不过在美国,量化方法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史学家将统计学模式应用于政治(主要是选举)行为、人口、城市化及社会地位分层等方面的研究。<sup>③</sup>法国亦出现步量化后尘的史学研究,如年鉴派的所谓心态史研究就是通过把成千上万的遗嘱输入计算机,分析 17—18 世纪巴黎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据此衡量时人的世俗化程度。<sup>④</sup>

社会科学史,同样主要是在美国,乃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地位异常提高所催生的现代化概念。其实现代化观念并非始自美国,甚至可追溯到启蒙时代,但这一时期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紧密地联

---

<sup>①</sup> 例如 Carl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1965。

<sup>②</sup>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1979, p. 89。

<sup>③</sup> 有关奴隶制的量化研究模式,可参阅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1974。

<sup>④</sup> Michel Vovelle, *Piété baroque et déchristianisation*, Paris, 1973; Pierre Chaunu, et al., eds., *La Mort à Paris*, Paris, 1978。此时大多数形式的社会史仍囿于西方中心论而缺乏全球视野,但年鉴学派却不同于兰克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前者并不认为历史的进步必然导向现代西方的完满。





系起来。<sup>①</sup> 现代化理论只认可一种高级文明即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引领世界步入现代化。这一理论的假想前提是：各种非西方文明不只低劣，且最终须步西方文明之后尘。大多数 19 世纪的史学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均持这一观念。1945 年以后的历史社会学大多描述的是得意洋洋的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美妙融合之地——代表着其他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所谓第三世界国家，若要摆脱贫困，毫无疑问地要步美国之后尘。现代化理论同样为冷战中与苏联社会主义对立的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武器。

## 第四阶段，约从 1968 年至 1990 年

1968 年可谓一个多事之秋：在美国的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议运动及非洲后裔美国人的反抗行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遇刺；世界各地的文化或政治中心此起彼伏的骚乱，伯克利、巴黎、西柏林、东京、墨西哥城，当然还有“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这种种不满远不止民权问题和越战问题所能涵盖，它关乎时人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深刻积怨。首先是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因为生存环境的毁坏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盲目追求增长的运行模式。然后是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整个历史和西方文明就是建立在对女性处处施压的基础之上。不过最终所有这些抱有乌托邦式幻想、冀求一个崭新世界的抗议运动均以失败告终；但抗议运动本身却影响了人们的社会态度转向。

所有这些对历史的书写有何关系？关系重大。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和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除了改革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P. 汤普森（Edward P. Thompson）之外<sup>②</sup>——均坚信历史的科学性，认为历史乃引领西方登上发展制高点的整体过程。现在，这两种观点均遭到质疑。史学史的定位与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批判可谓密切相关，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内容等本质问题。科学的观念与现代文化有关。法、美的所谓后现代哲学家如海登·怀特（1928 年生）、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sup>①</sup> Walter W. Rostow,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Marxist Manifesto*, Cambridge, 1960.

<sup>②</su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3.



1915—1980)<sup>①</sup>、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sup>②</sup>、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sup>③</sup>等直接质疑历史的科学性,强调历史不过是修辞与虚构的产物。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过去的观念遭到摒弃,同时历史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社会科学史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所描述的并非真实存在的人,而是抽象的结构和过程。有鉴于此,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 1919—1999),这位曾在早期的《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发表大量有关阶级结构和组成分析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重量级史学家1979年在同一刊物上撰文《叙事的重生》(*The Revival of Narrative*),可能有些为时过早地宣布了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学科范式已经寿终正寝。斯通认为,社会科学史的核心观念,即史学家能够“对过去给予贯通一致的科学解释”,已经遭到摒弃。<sup>④</sup>取而代之,现在的史学家正对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这同样需要新的史学方法论。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备遭诋毁,但时下兴起的文化史依然倾向于政治上的左派立场,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张挞伐,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对内的种种不平等和对外的殖民及帝国主义政策。

不过新史学现在的重心不是针对民族国家从经济的角度给予批判,而是要面对各种形式的歧视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歧视现象乃政治、经济的统治所致;而现在的观念则是福柯式的,变得越发宽广,看到了歧视现象生成的文化和人际背景。这一时段的史学摒弃客观学术的观念,将自身视为抗击压迫——尤其是对女性的压迫——的一种积极的力量。新文化史的理论家及女权主义史学的倡导者琼·斯科特(Joan Scott, 1941年生)指出,女权主义史学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即结束女性“无形、无权和备受压制”的局面,建立一种“女性的历史”(her-story),使女性成为历史

---

① 新史学对国家的批判已不限于经济学的取向,而囊括内涵更为宽广的各种形式的歧视现象。此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从属关系为政治经济压迫的结果,现在渐被福柯式的理论所取代,后者以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和人际关系命题重新审视从属关系的形成过程。史学理论也大多摒弃所谓学术客观的观念,而将自身看做是反抗剥削压迫斗争中的一股积极力量。正如女权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所称,女权主义史学有一个明确的政治使命,即结束女性“不见踪影、无能为力和屈从依附”的状态,创造一种标榜女性历史主体地位和作用的“女性史”(her-story)。

② Foucault, *The Essential Foucault*, New York, 2003.

③ Derrida, *On Grammatology*, Baltimore, 1976.

④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85, November 1979, pp. 3—24.



的主动创造者。<sup>①</sup>

对此的反应之一是所谓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sup>②</sup>两种转向均摒弃历史真理的概念，认为全部历史叙述不过是文化和语言决定的，声称所谓真实的历史在历史学家构建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据称，语言并不能反映外在现实，而是创造了现实。因为根本不存在构建历史的所谓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所以针对过去总有各种解释，其中任何一种解释均无法被证实或证伪。有些印度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更视西方科学乃植根于西方帝国主义及白人至上论。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1937年生）强调这种科学的毁灭性特征，认为由其所萌生和滋养的世俗观念应对20世纪的各种恐怖行为负责，并呼吁恢复过去那种历史神话阶段的记事惯例。<sup>③</sup>

但无论如何，现行的历史学家大多不为摒弃批判方法论的种种呼吁所动。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先是在法国，后来主要在美国，绝大多数属于文学理论家，高居学府，但一般不从事历史的书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突出强调历史研究中记忆的作用，即不关心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而关注历史记忆在塑造群体认同过程中的各种组成元素。<sup>④</sup>从积极的层面说，后现代、后殖民学术讨论对史学史的贡献在于，它迫使史学家重新思考自身的行当，极大地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范围。很多历史学家从关注历史事件转向关注历史记忆，不止如此，他们还潜心探讨哪些东西被历史遗忘或压制了。<sup>⑤</sup>所有这一切对理解人们的集体认同均至关重要。新的话题得到挖掘，而不止局限于过去那种仅执著于政治层面或社会科学仅关注非个体的框架结构和过程的做法。人类生存的许多方面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比如情感与心理状态，所谓被压制、被边缘化阶层，而不止社会上层、女性与性别、两性关系等。

<sup>①</sup> Scott, "Women's History", in Peter Burke,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1991, p. 45.

<sup>②</sup> Victoria E. Bur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1999; Gabrielle M. Spiegel, ed.,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2005.

<sup>③</sup> Ashis Nandy, "History's Forgotten Doubles", *History and Theory*, 34: 2 (1995), pp. 44—46.

<sup>④</sup> See Pierre Nora, ed., *Les Lieux de mémoire*, Paris, 1986—1993; 英译本为 *Rethinking France*, Chicago, 2001. 同时参阅 *History and Memory* 杂志。

<sup>⑤</sup> Paul Ricoeur, "Memory-Forgetting-History", in Jörn Rüsen, *Meaning and Representation in History*, New York, 2006, pp. 9—19.



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并未沉寂,这一点可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盛行的有关贫困问题的讨论一见分晓。作为一场学术运动,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之前便遭诋毁。现代化理论家们声言资本主义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及对西方文化的采纳是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关键所在。深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理论家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年生)<sup>①</sup>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 1929—2005)<sup>②</sup>试图证明正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停滞,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 1923年生)则主张非西方文化的独立性应该得到尊重。<sup>③</sup>

## 第五阶段, 约从1990年至今

苏联的解体显然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但它同时标志着史学史发展的转折吗?对此,可说是,也可说不是。历史及史学史的发展均与以前曾经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存在某种连续性。在新的形势下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从而去除了自冷战之前便已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诸种障碍。经济全球化同时加剧了全球范围文化上的同一化(homogenization)进程,马克思主义早已不再构成这一过程的学术及政治反对力量。<sup>④</sup>就史学史而言,20世纪70—80年代萌发的各种新课题、新思路,对文化与性别的特别关注,则继续影响历史的书写且呈现愈加明显的全球维度。对这种新形势曾出现两种颇具影响的估价。一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年生)的《历史的终结》,<sup>⑤</sup>可谓是一种迟到的现代化理论,作者非常自信地预言:整个世界将最终追随美国步入现代化,从此,战争将不再发生。

①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3 vols., Minneapolis, 1974—1989.

②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7.

③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1984.

④ Chris Wickham, ed., *Marxist History Writing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Oxford, 2007.

⑤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pp. 3—18; idem.,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1992; 同时参阅其文章 "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History Five Tears Later", *History and Theory*, 34: 2, 1995, pp. 27—43. 不过福山近年来对其原有观点进行了修正,参阅其著作 *America at the Cross Road: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2006。



相比之下，另一学者则为世人展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前景，即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一书，<sup>①</sup>作者所预见的未来不是经济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爆发的冲突，并预言在西方与非西方主要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之间将出现永无休止的冲突。现在离两位理论家发出预言的时间已近二十载，两种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均有应验。一方面是汹涌澎湃的经济势力或曰资本席卷全球，另一方面是对此的文化抵抗，但二者均不能用来充分描述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全部特征。金融资本业已渗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正在改造着各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对于这一点事实自不容辩驳，但它同时遭遇了种种修正和抵抗，且自2008年起进入了深刻的危机。所以说，2009年的世界在诸多方面均不同于1989年或1990年的世界。福山预言的和平并未如期而至，代之而来的是动乱和战争；但亨廷顿却未能预见现代化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所释放出的强大力量，显然他的视角是过于静态了。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总体上低估了诸如此类的冲突，而假定非西方社会平和地全面接受西方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最近的全球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将多样化社会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抗力量考虑进去。

转向史学史。20世纪70—80年代生成的文化主义（culturalism）在对理解当今世界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存在自身的盲点。后现代史学史的目标之一是把文化从其政治的大背景之中解放出来，并破解社会科学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后现代史学史绝非马克思主义性质，但依然强调现代社会有不公平现象和统治压迫的存在，且将两性间、民族间尤其是种族间的歧视均视为此类社会不公平。此外，还有后殖民时代各种新型的帝国主义，结果致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先前贫困的殖民地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继续加大。

2009年的史学史更是气象万千。显然，稳定的范式是不存在的，正如稳定的范式过去从未出现过一样。当代史学史依然明显地落后于瞬息万变的显著变革。20世纪60年代以来备受瞩目的两性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及种族关系问题越发受到重视。对历史问题的处理表现出更多的比较和全球的视野。不止西方史学家越来越多地看到了非西方世界并对某些问

<sup>①</su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1996.



题展开深入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史学家们亦对国际间的商讨表现出越发浓厚的兴致。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肇端于印度却对西方甚至拉美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庶民”(Subaltern)研究运动。庶民研究运动与西方的后现代及后殖民史学间有深刻的交互影响。“庶民”一词来自意大利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著作。史学必须触及社会底层,触及那些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被剥夺者,现已成为左派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史学研究社会文化转向启发所致。

现在谈谈文化主义的盲点。文化主义的用意是政治性的,即克服社会因性别、阶级成分或种族所属而对部分人群的剥夺现象。但文化主义及语言学转向的主流均未能认识到人际关系得以发生的体制、政治和经济背景。比如对琼·斯科特而言,历史乃语言的创造,所以排除了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因为后者是社会科学所为,而社会现实不过是历史学家的建构,除此无所谓社会现实。但历史研究,哪怕目的是要克服传统社会科学的狭隘客观主义,却也必须关注各种形式的阶级、性别或民族压迫现实方有望最后克服之。这就要求史学家具备富于批判性的社会科学方法。传统社会科学经验式量化的研究取向带有一种强烈的美国色彩,习惯于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为理所当然。史学不能过度依赖试图解析群体社会现象的社会学 and 经济学,而有必要以新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加以补充,因为后者不止关注因果关系的分析,且更侧重于寻找理解文化世界的方法,既有宏观社会文明层面的解析,又有微观历史的考察,不忽略小规模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就某种意义而言,上述思虑已经演变成当今的史学实践,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70—80年代兴起的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多元史学新思路,与此同时避免了其针对历史知识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sup>①</sup>

(孙岳 译)

<sup>①</sup> 比较 Robert Gildea and Anne Simonin, eds., *Writing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2008。



ings of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and New Global History. While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y are united in seeking to transcend Eurocentrism and to rise above the nation-state framework where possible. In addition, though using history as the main discipline, all three seek to one degree or another to be multi-disciplinary as well as interdisciplinary in approach. All three efforts, basically, are linked by a common perspective, one which builds on post-colonial and post-imperialist attitudes, and focus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historical process. World History potentially embraces “everything”; Global History picks the strand of World History involved the global processes, which is defined as a increased interconnectivity and interdependence wherever and whenever they occur; New Global History focuses on the contemporary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underlining bo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Keywords: 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 New Global History

## Main Stag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Georg G. Iggers

(SUNY Buffalo)

Abstrac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major changes in historical thinking and writing in the last half century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eriod after World War II saw a determined attempt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history focusing on political events and personalities by an analytical social science concentrating on soci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of change, often having recourse to quantitative models. This approach was closely linked to modernization theories that took Western, particularly American, models of capitalism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as a norm toward which modernity on a worldwide scale would move. The world of the 1960s saw an increasing discontent with this norm witnessed b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opposition to post-colonial wars, e. g. , in Viet Nam, the call for women’s rights, and the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istoriographically this discontent expressed itself in postmodernism which rejected the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with anonymous soci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and saw history no longer as a scientific or even scholarly enterprise



but as a form of imaginative literature. They questioned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ts science and called for an alternative historical culture concentrating on the popular classes, as the Indian Subaltern Group did, rejected the idea of history as a unitary process with its center in the West, and the idea of o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inquir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ystem around 1990 and with it the end of its form of socialism as an alternative, on the one hand removed the barriers to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Western style capitalism, on the other hand led to resistance to cultural hegemony which often took a violent form. Historiographically on the one hand main trend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1970s and 1980s dealing with ethnic and racial equality, the active role of the subaltern classes and women's rights played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historiography after 1990, which also took on a greater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pistemological relativism and irrationalism of postmodernist theory lost ground in the face of new realities. The latter resulted in greater attention being give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which however benefited from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postmodernism including its recognition of the role of cultural factors.

Keywords: Stages;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Global Perspective

## 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

Dominic Sachsenmai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Duk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expanding field of global history and its wider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In a first step the author outlines the rising interest in transcultural and global history that can be observ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is context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global history as well as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and periodizations are discussed. In a second step the author reflects upon the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global history in an age in which universalism and Eurocentrism have long come under attack from many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article discusses dependency theory and subaltern studies as two very different precursors to the current critiques of Eurocentrism. The im-